

人年轻的时候,总爱那种小小的包。小得只装得下一支口红,一面小镜子,几张钞票,和一点不着边际的心事。拎在手上,仿佛人也会跟着轻一点,走路都像是在老电影里,去赴一个不必太认真的约。那时总以为,女人的包,和耳环、高跟鞋一样,不过是装点自己的一部分。

后来年纪渐长,生活渐渐换了样子,才明白不是这么回事。一个成年女人出门,要带的东西越来越多:钥匙、钱包、药、纸巾、记事本、发票、充电器、电脑,临时买回家的菜,顺路替家人捎上的东西,哪一样都不能少。于是包也跟着变大。起初还有点不情愿,觉得不够轻盈,不够俏,不够像过去想象中的自己;再后来就彻底认命,甚至生出一点朴素的感激来——幸亏有它,替我把这些零零碎碎的现实,一并装下。干上劳动妇女之后瞬间明白的道理,羊大为美,包包亦然。这个春天,作为全职女儿,我每天带出门的是这个——劳动妇女买菜大包。

前些天剥毛豆,顺手重看了老电影《不了情》,陈燕燕出场时,我留意到的是她手里的那个黑色手包。它不小,甚至可以说,是偏大的。放回我们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都市女性的想象里看,这样的包已经不是单纯的装饰了。它更像一件器物,一件真的要跟着女人出门、办事、奔走、过日子的器物。

1943年,《立言画刊》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女人的手袋史》。文章写得很妙,说从前女人的手袋,不仅是装饰

物,还是“秘密的小抽屉”。七岁时,可以把月饼盒当手袋;大一点,用香烟盒装扣子、票根、发卡;再后来,有了真正的丝绒小袋,里面放镜子、粉、手帕、零钱、戏票、纸条,甚至一支小小的铅笔。

作者说,手袋像一个人的性格,“收敛,讲究,却藏着不肯示人的心事”。最打动我的,是其中一句:一个女人的手袋,常常泄露她的时代。真正让包包发生基因突变的,是战争。战争把一切都逼向现实。成千上万的女性走出闺房,进入办公室、商店、医院和工厂,她们开始要赶车、打车、管理自己的时间。那种只能装手绢的小袋子彻底崩了。她们需要更结实的皮质、更安全的锁扣、更科学的分层。包越变越大,越变越硬,越变越不娇气。说到底,包什么时候变大,常常取决于女人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进入公共生活。

让我们回到《不了情》,再看看陈燕燕那个大手包,它明显更接近日常,更接近白天,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有所携带”。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生活不过如此:一点情绪,一点体面,一点隐秘的小心思,都装在一个小小的包里,也就够了。后来年纪渐长,才知道成年女人出门,带着的从来不只是口红、镜子和零钱。她带着钥匙,带着药,带着票据,带着待办的事情,带着替自己也替别人收拾残局的能力。她带着她的小世界,走进更大、更琐碎,也更真实的世界里去。

这样想来,大大的包属于谁呢?属于那些一路从小包时代走来,最后学会把生活稳稳拎在手里的女人。也属于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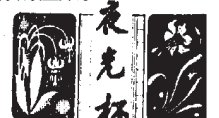
纽约物价

在纽约小住二周有余。周末去了在曼岛第六大道举办的美食节。侧身挤入人群,贪婪而满足地吮吸着烟火味,汪曾祺的“人生大事吃喝二字”跳出脑门,接地气的吃喝才是人间真滋味。挤入摊位前细看,却被标价镇住了,对纽约物价高腾心有戚戚,但短期内见到高如许的涨幅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一个紫菜包饭团8美元,附加9%的消费税和20%的小费。一盒五个的章鱼烧18美元,另加消费税和小费。怪不得说纽约的一碗拉面在东京可以吃上三碗,现在看来远不止了。纽约的物价披着一种狮虎的蛮横扑面而来。曼哈顿的一杯咖啡加一小块小甜点,轻易就掠去你钱包里的20美元。

近年纽约的高价不景气口地贵得让人难以喘息。曼岛公寓的房价已膨胀到令人咂舌。一顿寻常的午餐,账单的金额让人恍惚吞下的是金箔,就连昔日弥漫着波西米亚气息的布鲁克林街区也排列着不菲的精品店和咖啡店。当下的纽约变得前所未有的“贵”了,是货币意义上的高贵,更是一种气质上的紧绷和矜持。它似乎在提醒你,这里就是这个价,你既在此,便要为此埋单。

那些肩上顶着最精明头脑几乎指点把控着过去几十年世界走向的英才在纽约昂贵的节奏里步履匆匆,你能看到这些精英最鲜活也最疲惫的面孔,兴奋与焦虑交织在他们的每一道皱纹里。中国也有“少不入蜀,老不出川”的老话,就如购房一样,你选择哪个区域其实你就是选择了哪一种生活方式。为人生通道理单,这是匆匆疾步的年轻人选择,吃不到的苦比吃苦更苦。

那个曾经可以漫步、可以在旧书店的黑胶唱片里流转出的悠扬声中一杯咖啡消磨午后时光的纽约去哪儿了?也许需要你更多的心力才能触摸到它内核或许尚存的温柔。



疏柯远岫 水墨画 邱贺

年少读书时,无睡懒觉的资格,不容纠结,更无法赖床。到点,大人叫醒,便翻身下床,草草洗漱,吃过早饭,匆忙飞奔学校。那时的早起,是被动的习惯,是不容违抗的纪律。

步入职场,作息渐渐有弹性。清晨不必再被叫声、铃声裹挟,便多了许多熬夜的借口:应酬、观影、刷短视频,不知不觉便熬到深夜,晚睡晚起成为常态。

改变,始于一位我喜爱的瑜伽老师。初遇她时,我是个瑜伽小白,身体僵硬,体式生疏,她耐心辅助,总体贴地说不急慢慢来。她的文字和极简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吸引我的魅力。

病毒来袭,线下课堂暂停,她第一时间开设近乎公益的线上晨练课。每周一、四清晨六点半到七点四十五,十几位同学如约上线,我便是其中之一。

早已习惯弹性作息,最初上晨课的我,满是痛苦与挣扎。惦记着早起,让前一晚更难入睡。天未亮透,闹钟骤响,如同午夜惊魂,条件反射地迅猛缩腿脚。

顾毓琇与孙大雨的友谊

孙近仁

顾毓琇与孙大雨之间的友情可谓源远流长。1921年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校园纯文学团体——清华文学社。顾毓琇、闻一多、梁实秋是该社的骨干;1922年孙大雨也加入,并成为该社的积极参与者。顾毓琇与孙大雨的交往应是由此开始的。

顾毓琇是一位文理兼通的全才,虽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但他的文学造诣也极其深厚,他的学养涵盖理工、文学(新诗、戏剧、音乐)、教育等诸多领域。抗战胜利后,他曾任上海的教育局局长,其间他大力支持熊佛西等创办上海实验戏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现上戏校园内有一座“毓琇楼”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他还参与创建上海师范专科学校。1946年孙大雨从重庆返沪后,先后在上海临时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也受邀在上海师专兼教职。在此时期,顾毓琇还在上海交大任教。

再说抗战时期,孙大雨任教于国立上海暨南大学,他因揭发、反对学校当局的某些人利用公款发国难财的行径而遭到解聘。1941年孙大雨遂决定去大后方为抗战效力,他应四川大学之聘,转道香港,于1941年12月2日抵达陪都重庆,六天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重庆逗留期间,他与顾毓琇重逢,倾力劝孙留在重庆,去中央政治大学任教,孙则表示已先受聘于川大,感到为难,后张道藩也竭力主张孙去政大,并表示他会向川大说项疏通。在此情形下,孙大雨就留在了重庆。孙大雨一方面在政大外交系教英文,另一方面还想将暨大公款

投机案搞清楚,可是顾毓琇告诉他,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根本不想过问此事,这使孙大雨十分失望。

在1949年前的几年中,孙大雨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积极投身民主革命运动中,并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此后他的命运却历尽坎坷。顾毓琇则南下,最后定居美国。从此顾、孙阔别数十年,直到1996年6月间,顾毓琇由美致信孙大雨:

大雨老兄惠鉴:
沪上晤谈,倏已十载,自1992年后,以年老体弱,已不能作长途旅行。

近从台北九歌出版社出版之《梁实秋之诗及小说》读到吾兄所作《代序》,回看往事,不胜感叹。吾兄以诗译诗,使莎翁成为诗人,而非仅为剧作家,厥功甚伟。惟不知是否全部付印。近来大陆对文学兴趣较浓,即旧诗词亦有出版者。译诗为新诗的滋养品,亦应有人注意。吾兄有空前长诗,不知近日曾重印否?

远道寄此,即祝健康长寿

弟 顾毓琇敬启

此信虽短,但传达了儿多讯息:一是,原来在十年前即1986年,顾毓琇曾回过国内,并在上海与孙大雨有过一次会晤。二是,顾毓琇从台北出版的《梁实秋之诗及小说》一书中见到孙大雨所写的《代序》(《暮年回首——我与梁实秋先生的一些交往》,原载于美国《中外论坛》,1994年第九期),从而触动顾毓琇念及老友写了这封信。三是,顾毓琇谓:“吾兄以诗译诗,使莎翁成为诗人,而非仅为剧作家,厥功甚伟。”顾本人曾写过十二部剧本,可说是颇有成就的剧作家,他以内行的眼

我读小学时,曾任校队守门员,一上场疯得不要命。不踢球时就看书,受着足球的诱惑,一步一步往那深不可测的乐园走。那时跟足球有关的书不多,多亏我的母亲在报社资料室工作,我钻到里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外加满手灰尘,总算找到一本,挺厚,挺沉,褐色硬皮上印着四个金字:《足球理论》,大约是上世纪50年代匈牙利人写的大部头。按说这种书给小孩子看,早了点,不合适,容易看糟践了。无奈我嗷嗷待哺,饥不择食,愣是把那书生吞活剥了一遍。其中,有关守门员的论述和图例看了还不止一遍,边看边琢磨,边比画。感觉上虽没有看《西游记》或《海底两万里》那么好玩,却有几分特殊的意趣,仿佛江湖傻小子寻得了武林秘籍,激动,庆幸,底气陡增而又不得要领,但自以为得了要领,就急不可耐,渴望过招,恨不得冲着对手大喊:这回你们就来吧!

哪一天,如果有记者向我提问,童年时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那么,我一定会庄重地把《足球理论》算作一本。除此之外,我还陆续看过其他几本足球书,当然都是重点看的守门员部分。开卷有益,渐渐开了窍,学到不少宝贵知识。比如说如何站位,如何封角度,如何指挥队员,等等,书上都有详尽的教导。还有,出击时为避免跟对方球员撞到一起,亲者痛,仇者快,守门员一定要高喊出声,示意我来了。报载,国足某著名门将出击时不愿这么喊,教练让他喊他也不喊。这不对,多年前我就知道不对。

还有,罚点球时的心理战术,也是我从书上学到的。当顾虑重重的罚球者将要起脚的那一瞬间,守门员突然大喝一声,惊吓对方,往往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试过几次,果然管用,不但罚球者吓得屁滚尿流,我方队员也跟着大吃一惊,半晌不动地方。奇怪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办法,现在比赛中却很少有人采用了。也许有关部门为了保护罚球者的身心健康,不让这么喊了?或者老这么喊,罚球者已经不在乎了,就像狡猾的昆虫一样,产生了某种“抗药性”。

不管怎么说,学习,尤其是理论学习,对球员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他是一名业余球员。我们那时没电视,没歌厅,没游戏机,时间有的是,正好用来学习,其实不是学习,是玩,是凭兴趣做事。马路上下棋的人,打麻将的人,跳舞的人,互联网上遨游五洲的人,不吃不睡,一熬就是半宿,可能还有蚊虫叮咬,汗水浸泡,别人看着辛苦,他们自己却沉湎其中,快乐得不愿自拔。

经过一番苦学苦练,或曰快乐的学习和训练,我的水平嗖嗖提高,牢牢坐稳了第一守门员的位置,我所效力的球队还夺得了沈阳市沈河区小学足球联赛冠军。今天,我虽然早不踢球了,但仍然怀念那本可爱的《足球理论》。

光,赞誉孙大雨用诗体翻译莎剧。盖莎剧是有韵律的素体韵文(Blank Verse)所写,严格地说,莎剧是诗剧或戏剧诗。孙大雨用他所创作的汉字“音组”格式,对应莎剧诗行中的英文“音步”,予以译诗,应该说比较接近于莎剧原作的风貌神韵。就连用散文译毕莎翁全集的梁实秋也说:“还有一位孙大雨,写诗魄力很大……孙大雨还译过莎士比亚的《黎琊王》,用诗体译的,很见功力。”四是,顾毓琇说:“译诗为新诗的滋养品,亦应有人注意。”顾本身亦是诗人,这应是他的精辟见解。孙大雨身体力行,出版了八部诗体翻译的莎剧和《英诗选译集》以及《屈原诗英译》《古诗文英译》《唐诗英译》等。五是,信中说“吾兄有空前长诗,不知近日曾重印否?”这是指的孙写的长诗《自己的写照》,这首长诗作者原拟写千行,但因时过境迁未能完稿,只发表过四百行。这首长诗一经发表,徐志摩就倍加推崇:“我个人认为十年来(这就是说自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台湾诗人痖弦发文认为:这首长诗“的确是中国早期新诗坛一座未完工的巨大纪念碑。”

由顾毓琇这封信的内涵来看,他对孙大雨的文学贡献有充分的理解,虽然他们之间分隔了数十年之久,但彼此是相通的。

童年喜欢的一本书

刘齐

十日谈

清晨你如何起床 责编:郭影

最喜小儿无赖,睡到人间饭熟时。

晨光里的“瑜”见

李元红

晨闹钟一响,脑海里便反复盘旋:今天就歇一次吧。疲惫的身体贪恋床榻,可心里又怕,一旦开了偷懒的先例,往后便有了各种不坚持的理由。

筋骨僵硬,精神萎靡。可随着呼吸与体式慢慢相融,身体渐渐舒展,直至微微发热、汗湿衣衫,身体的困顿与不适,竟一点点烟消云散。待到课程结束,那种熬过疲惫、挣脱困顿后的轻盈,是再香甜的睡眠也无法给予的。

就这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晨练渐渐融入身体,成为生活

的一部分。那些咬牙死撑的起床、习练,慢慢变成习惯。后来早起依旧会有挣扎,却不再抗拒;闹钟响起,虽有倦意,对一天的开始,内心是笃定和期待的。

曾经僵硬酸痛的身体,在年复一年的流转中变得舒展而有力量。即便前一天工作疲惫,一场晨练过后,也能迅速回血。

起床的方式,或许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从前,任由熬夜消耗自己。后来,不断督促自己早睡早起,在无数微亮的晨光里践行自律,一遍遍重复简单的体式,蹉跎晨练的苦与痛,几年扎实的习练,稳稳托举起身心健康。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今年,老师因个人原因,不再继续带课。回望“闻鸡起舞”的习练时光,心中满是怀念和感恩。晨光里的“瑜”见,奠定了我余生最踏实的身心状态底牌。